十八世纪思想文化论纲

黄　爱　平

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之一。它的起讫，大致相当于清代康熙中叶至乾隆末年，也就是旧世史家、史著所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一百年间，清朝统治阶级在继承、总结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发展的高峰。

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发展相应，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也处在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思想文化自身的逻辑发展，这种种因素的合力，决定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和总体特征，也构成了一百年间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丰富多彩的内容。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实行的政策，影响甚至支配着一定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康熙中叶以降，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恢复，统治阶级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渐加强，对文化活动的参与也不断增多。康、雍、乾三朝的思想文化政策，由于环境、条件和皇帝本人性格、作风的差异，因而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但总起来看，其具有如下特征：一、以“崇儒重道”为基本取向。武力的征服并不能取得文化的认同，落后的文化势必为先进的文化所融合。清王朝虽然凭藉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但要维系人心，巩固政权，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汉族封建文化。为了形成并维持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向心力，清统治者确立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大力阐扬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提倡纲常名教，力图以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来统一、规范人们的认识和行为。二、严厉镇压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满族贵族在统一中国过程中所使用的野蛮暴力和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存在着的华夏正统观念，不仅引发了清初延续数十年的广大民众的抗清斗争，而且导致了汉族士大夫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高涨。为了泯灭消除不利于其统治的思想言论，清朝政府蛮横地实行文化高压，查禁“违碍”书藉，大兴文字冤狱，甚至望文生义，罗织锻炼，不仅使得许多文人士子因此获罪，惨遭杀害，而且还严重地窒息了知识界思想的活力和创造性。三、拉拢优容知识分子。清朝政府在实行文化高压的同时，也注意利用传统的科举制度和儒家学说来笼络文人学者。清朝定鼎不久，即恢复了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与前代相同。康熙年间又特设博学鸿儒科，以网罗人才，为己所用。康、雍、乾三朝对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在修书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

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将广大知识分子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一方面，他们难以讲今论史，议论时政，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能在学问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当时封建社会内部尚不具备新因素产生的条件，而延续数百年的理学又已趋于衰颓的情况下，学术界唯一可走的就是复古，即恢复汉代经学的道路。于是，继清初百花齐放、博大恢宏的学术潮流之后，知识界殊途同归，最终走出了一条偏重于古代典籍整理及其相关学问研究的道路。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十八世纪成为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清理、总结的时代。这种清理和总结的成果，突出地反映在经学、史学以及文字、音韵、校勘、辑佚、目录等专科领域。

与当时的学术走向相应，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务实”的品格特征。文人学者在分析问题、品评人物，甚至读书治学之时，往往以是否“有裨实用”作为衡量长短得失的重要的价值尺度。在哲学思想上，抛弃流于空疏的宋明理学而返回到比较朴实的汉代经学；在治学方法上，也由一味空言心性，崇尚“六经注我”而逐渐转为注重证据，强调“我注六经”；即如诗歌、小说、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也不乏抒写性情的呼声，并出现了反映现实的伟大作品。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务实”的总体特征。

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还涌动着一股以背离传统为特征的异端思想。康乾盛世虽然造就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中国封建社会毕竟已经步入晚期，封建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盛世”后面的潜在危机，正逐渐暴露出来，一些敏锐的思想家、艺术家，已经有所察觉，并开始进行批判。十八世纪的异端思想，表现的领域较广，形式不一，但却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这就是对私欲的肯定和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戴震的理欲之辨，批判了程朱理学把“理”、“欲”截然对立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主张“理”、“欲”统一。他抨击理学“以理杀人”的言辞，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语。曹雪芹在其不朽名著《红楼梦》中，通过对宝黛的爱情悲剧和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兴衰历史的描写，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罪恶和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并揭示了其必然衰亡的归宿。在诗歌创作方面，袁枚、赵翼等人力倡“性灵说”，主张诗歌应该抒发人的真实性情和切身感受。绘画领域出现的扬州八怪，也力破传统的模式，强调以画抒情，大胆渲泄胸臆，批判社会。尽管这一时期的异端思想尚存在着不足，例如表达的方式比较曲折，自身的局限较为明显，并目还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但他们毕竟在当时相对沉闷、禁锢的思想界，撞击出了闪亮的思想火花。

十八世纪的文学艺术，则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在诗、词、散文领域，作者众多，作品丰富，流派纷呈。尽管它们出现在唐诗、宋词以及唐宋古文这些文学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之后，并且受当时学术界复古倾向的影响，一些派别和作品不免流于拟古、摹仿的形式主义，但清诗、清词以及清代散文的创作，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小说领域，继康熙年间蒲松龄创作了《聊斋志异》之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两部杰作，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强烈的批判精神，深刻的社会意义，卓越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并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戏曲的发展也十分引人注目。作为宫廷艺术的昆曲逐渐衰落，民间的地方戏曲蓬勃兴起，从而促成了戏曲艺术的重要变革，并为其后京剧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十八世纪的科学技术，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在天文历算以及测绘领域，主要表现在对以往理论的总结、发掘和进行实际操作、运用方面。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大多被朝廷以及士大夫所接受，雍正年间编成的《历象考成》和乾隆年间编成的《历象考成后编》，充分吸收了西方的天文学理论及其成果。数学领域则出现了梅文鼎、梅瑴成、明安图等一批著名数学家，以及官修《数理精蕴》这类具有很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戴震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一批古算经典著作，不仅使佚失多年的古代天算著作重见天日，而且推动了整理、校勘、注释古天算著作风气的发展，从而发掘出一批濒于失传的珍贵古藉。在地图测绘方面，康熙和乾隆年间先后进行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运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绘方法。根据实地测量结果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在建筑领域，十八世纪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建筑工艺和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这一百年间相继修成的北京圆明园、清漪园、北海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宫殿，

布局合理，结构精致，姿态万千，堪称建筑技巧和园林艺术的完美结合。

从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总体状况来看，这一百年间，既是思想界比较沉闷、禁锢，思想火花闪现较少的时期，同时又是学术文化繁荣兴盛，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总结、继承并进而向前发展的时期。思想文化领域这种看上去似乎十分矛盾的现象的出现，除了根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之外，与统治者实行的文化政策，是不无关系的。事实上，以往对于清朝政府文化政策中专制的一面，或多或少有所夸大。专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必要手段，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着，这已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历朝统治者对妨碍其统治的思想文化，无不进行严酷镇压。清朝政府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无疑也是十分严厉的，但是它所针对的目标却比较集中，主要用于镇压、清除那些反对、攻击或者不满清王朝统治的思想言论和民族意识。当然，其中不乏深文周纳、吹毛求疵之处，以至造成众多的文字冤狱。但在这一禁区之外，对不同学术、学派、宗教的存在，以及科学技术的探讨，乃至文学艺术的创作，清朝政府采取的则是优容并蓄的措施。如调合汉宋之争，允许释道并存，即便外国的传教士，也一度在朝廷中任职，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实践。这种有所侧重的文化专制，禁锢与优容并行的政策措施，对十八世纪思想文化总体格局及其特征的形成，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明清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所持的封闭与短视态度，无疑对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格局及其走向产生了消极影响。康熙年间，中外文化交流还比较活跃，雍正则驱逐传教士，关闭了国门，乾隆时期更以“天朝上国”自居，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打开国门，迎接挑战的机会。因此，十八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从事文化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可供借鉴，而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所能依据的也只是传统的思想理论学说。这就造成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相对封闭的一面：一些异端思想的闪光，并没有走向近代的民主启蒙思潮；个别朴实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未能发展成为近代意义的科学方法。就此而言，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尽管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发展的高峰，但它毕竟只是传统文化的终结，而非近代思想的开端，与同一时期西方出现的民主启蒙思想相比，它已经明显地落后于世界的潮流了。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52 页。

(上接第 8 页)

重惩治贪污的条例，但依律例拟斩监候的贪官到秋审时也多改入缓决。至乾隆时才开始从正面批判“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一儒家数条入手，最后对《大清律例》中“侵盗钱粮千两以上应斩”、“依限完赃者可减等免死”的条例作了根本性修改，故而乾隆一朝一、二品大员因贪婪处死者多达三十人，乾隆四十六年以王亶望为首的甘肃官员贪污大案共正法五十六人。有清一代这是空前绝后的，所以晚清律学家薛允升称乾隆二十三年修改惩贪条例，是“刑典变化的一大关键”(见《读例存疑》)。不过乾隆刚一去世，又重新恢复了“完赃减等”旧例，而且进一步规定“不能依限完赃者永远监禁”，异言之，贪污罪的最高刑不过无期徒刑而已。这也进一步证明传统观念多么牢不可破。康、雍、乾三帝从满洲务实的传统出发，突破了儒家的某些金科玉律，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当然，他们批判儒家思想也不能一概而论，应予恰当的、具体的分析。